

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灯火阑珊处

——评韩青辰的《中国少年》 □海 飞

主题出版、重大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出版，是新时代出版的重要内容。在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出版中，如何做好主题出版，如何做好重大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出版，一直是儿童文学界和童书出版界孜孜不倦的追求。“东风夜放花千树”“众里寻他千百度”，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韩青辰的《中国少年》，正是“灯火阑珊处”的一部宏大叙事儿童化书写的优秀作品。

用大格局大视野抓好重大题材出版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依托儿童文学精品生产体系，紧扣正确导向和时代需求，聚焦自身优势，为广大少年儿童打造了一批思想性、时代性和文学性兼具的主题出版力作。2020年，苏少社推出的抗疫主题绘本“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将中国人民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大爱精神传递给全世界儿童。2021年又推出“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书系，展现党领导人民在各个时期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这两套主题读物具有共通的特点，都是通过儿童视角，以小切口呈现大时代，体现个体与时代的共鸣，书写属于儿童的当代史诗。

2022年，苏少社又推出了以新安旅行团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儿童小说《中国少年》。这是一个主题宏大又非常接地气的作品。尽管与之前的绘本图书在出版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内核是一脉相承的，即以鲜明生动的儿童视角来呈现大时代的情感和精神，描绘广阔宏大的时代图景；以充满精神感染力、文学感召力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让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张力和能量；以厚重的文学佳作来启迪小读者，从而达到传承精神、引领成长，培养新时代自信自强、爱国爱家好少年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中国少年》正是着眼于弘扬“新旅”精神主旋律，以文学的审美熏陶人，以作品的内涵教化人的一部上乘之作。

苏少社用大格局大视野抓好重大题材出版，充分体现了出版人文化自觉的出版意识。他们切实贴近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的讲话精神，贯彻自己的出版实践。这样的出版行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依赖于一群有格局、有视野、有情怀的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



用书刊联动的优势打造文学精品

《中国少年》的出版，凝聚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两个编辑团队的心血与热情。看起来，这两个团队差异明显，《人民文学》杂志在首都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位于古城南京；《人民文学》杂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文学刊物、中国当代文学刊物的领潮者，致力于成人文学领域的深耕细作，苏少社则以少儿读物出版为己任，策划、出版了一大批符合儿童审美、彰显时代大美的佳作。

两个编辑部门联手打造这样一部精品力作，也是恰逢其时。选题启动后，202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这一新闻的出现，也给这个选题的推进注入了新的能量。这是机缘巧合，更体现了两个出版团队共同的出版理想和专业眼光，是一次跨界跨域的文化与出版的强强联手和有益合作。

两个团队充分发挥出各自优势。《人民文学》团队复制成功运作主题项目的经验，安排作者去往当地做深度采访和资料收集。苏少社团队深谙儿童审

美情趣和阅读期待，编辑工作前置，与作者一起探讨人物设置、结构线索以及情节推动，既厚植历史，也记录时代，为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初稿完成后，双方又协同推进，精心打磨，终于适时推出了这部有童趣又有深度的作品，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革命传统、赓续红色精神的优秀文学读物。

这样横跨大江南北的书刊互动式合作，在少儿出版领域比较罕见，可谓一段出版佳话。《中国少年》从策划到顺利出版，只用了一年多时间，让我们看到澎湃的热情和高效的协作，发挥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用时空交错结构进行文学双线融合书写

《中国少年》的构思非常巧妙，采用了两个视角切换的双线结构，好像影视剧中的转场，将跨越近百年时空中的人物故事进行了有机糅合。

一个镜头对准的是风雨飘摇的年代，聚焦新安旅行团的“小好汉”们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勇敢地走出校园，践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决心，宣传党的主张，努力成为时代新人的英雄事迹。1935年秋，“新旅”的小成员们在校长江汪达之的带领下，从苏北淮安西门外的古运河码头出发，登上南下的小轮船，他们要用文艺播撒抗日的种子。这些孩子们每人只带着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只小挎包，他们的武器是一套电影放映机、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歌曲唱片。这支“小好汉”的队伍由最初的14人壮大到后来的数百人，17载峥嵘岁月，5万里救亡征途，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另一个镜头对准的是新时代的新安小学。新安小学的孩子们要排演一部关于新安旅行团的话剧。这部剧中的故事发生在近百年前，要怎样才能演好近百年前的人和事？这是一个难题。孩子们在探访和学习“新旅”历史的过程中，越是深入了解过去孩子们的种种艰辛，越能激发现实中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成长。当他们走出“新旅”的剧情，走出剧中的角色，面对自己的生活时，那些在和历史人物的情感交织中获得的精神力量便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于是，新旅的“小好汉”们爱国奋进的昂扬风貌，在新安小学的“红领巾”们身上得到了新的传承。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少年》这部作品，内容题材新颖，故事结构与情节的选择和处理妥当，实现了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宏大叙事的儿童化书写。在这样跨越时空的彼此勾连中，两个时代的少年在不同场域中向阳生长。不同时代虽然有不同时代的环境和要求，少年人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为未来勇敢担当的传承始终如一，并以不同的形式付诸行动，从而完成了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强国复兴有我”的自豪感也呼之欲出。



《中国少年》内页插图

人间烟火，七分落地，三分升腾

——《露天厨房》创作谈 □荆 凡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家里做饭用的是火炉子，一种是烧柴火的，一种是烧煤球的。湖南人做菜喜欢爆炒，主要由柴火锅担纲。煤球炉子则常年轮番坐着水、煮着饭、炖着汤，帮我们解放双手。我爸妈都能做得一桌好菜，我和弟弟自然就都爱烧火，因为可以在灶边提前品尝菜的咸淡。先一步入口的美食，似乎藏着偏爱的味道，也是童年最切实和温暖的记忆，一小口就足以抚慰小小心灵里碰到的所有不如意。看着各种各样的柴在火塘里劈劈啪啪地吐火，尤其是冬天，浑身被烤得暖洋洋的，很舍不得离开。有时候，我们也会帮大人给炉子换煤球、掏煤渣。小学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小伙伴走走玩玩，偶尔看到青烟四起，就知道要加快脚步回家吃饭了。童年就在这烟火气的落地与升腾里，看人看物看世事流转，一年一年过去了。

后来我到了城里，就很少见到柴火灶和炉子了。20世纪90年代，偶尔在街边，会看到卖早点的推车用了煤炉子，我还觉得熟悉，后来也难得一见。城市里的烟火气也是深入肺腑的。在北京老城区的巷子里走着走着，沿街闻到各种菜香，忍不住一边想象着那做菜的场景，一边深深吸气，可爱入魂。隔三差五也会自己掌勺做饭，出锅前给孩子尝一尝，仿佛瞬间和他一起回到了童年。而他满足的样子，让我觉得已经拥有了全世界。

所以，当偶然看到一篇关于肿瘤医院旁边抗癌爱心厨房的报道时，我瞬间就被击中了。看着那新闻照片上的煤球炉、各色餐具，读着那普通人十多年如一日的好人善行，所有关于厨房的记忆和经验瞬间复活、被调动。而那些与疾病、死亡相关的经验也一起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如丝如网，将我捕获——比如我从小就害怕死亡，到小伙伴家玩，贸然闯进了他奶奶的房间，看到了他奶奶临终前的场景，吓得落荒而逃；比如亲友的患病经历——外婆、我高中班主任和研究生导师都因罹患肿瘤离世。当然，还有各种心灵层面的记忆和经验，情绪的、心理的、审美的，比如半夜躺在黑暗中听到老奶奶去世后做法事的音乐，极其恐惧；比如不擅长面对疾病和离别……

作为一个为孩子写故事的人，我发现很多孩子和我一样，对厨房有多熟悉，对病房就有多陌生——家长们似乎不太愿意带孩子进医院。又因为学习等各种原因，孩子们很少能陪伴与抚慰病房

里生病的长辈，更别提临终的亲人了。就像我一样，因为高考、外地求学等诸多原因，我外婆和祖父母五人离世的时候，我竟都不在身边。不能在生命的最后陪着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多一些温暖，少一些痛苦，我万分愧疚。

那肿瘤医院旁边的爱心厨房，竟然能同时汇聚凡俗人生的日常与终极，生与死在这里拉锯，无数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而爱心厨房创始人年复一年的善意和爱，也像一束光照亮了那厨房和病房。我知道这有多么独特、多么难得。于是，我尝试写了这部小说——《露天厨房》，以小主人公夏子的视角，讲述了围绕在肿瘤医院旁边的抗癌厨房发生的人与事。这是一个群像型的故事，笑与泪、悲与欢，苦难与希望、困境与光芒，轮番在两个空间上演，而类似安宁疗护等一些目前尚不太普及的医疗方式也被安排到了故事里。

因为涉及生死，也因为选择写给孩子，这个故事天然就很沉重，也天然有难度。我知道难能，索性尝试用游戏的心态去创作。

“轻”和“重”一直是写作中拉扯着我的两个关键词。那些亲历的、间接获得的、关涉心灵的种种生死与疾病的经验，像一根根弦一样紧绷着。但我更期待的，是像童年翻花绳一样轻盈地编织和演绎。所以，我加入童心，动用想象，剔除矫情，小心调配着感性和理性的比例，努力克制，力争让故事轻盈如蛛丝，而那些沉重的部分则必须冷却、凝练，最终如点缀花绳上的露珠，迎风欲坠。幸运的是，当我回过头来看，蛛丝未断，露珠也还能照见光芒。

翻弄这花绳的翻云覆雨的手，看似来自我，实则来自生活、命运、童心、人性，以及更加宏大的生命规则与社会规律。因为它们的参与，故事里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疾病等困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各自必然的命运；因为它们的参与，故事折射了现实世界中的爱与善意，以及病患、医护人员等平凡人对生命的执着坚守；因为它们的参与，故事所讲述的凡俗人生，即使千疮百孔，也光芒闪耀。

作为一个面向孩子的写作者，我深知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把故事讲好。但每个故事，都不可避免地承载着如皮肤一样包裹着我们写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这个故事也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我对生死的理解。我没有在这个故事里安排医学层面



的奇迹，但故事里的人们在困境中默默地相互扶持，这本身就已经是生命的奇迹。写完这个故事，从童年开始就藏在我心里的死亡恐惧也像伤口一样被揭开，又被抚平，这也是文学在创造时间、创造爱、连接生死、连接人心之外赐予我的奇迹。当然，我的幸运不止于此，在初稿写完以后，我得到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专家和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老师们的帮助，他们给我提了很多切中肯綮的修改建议。因为他们的帮助，故事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希望这些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能像故事里和现实中平凡的烟火，在读者的心灵秘境里，七分落地，三分升腾。紧贴大地的，化作养料滋养菜花朵朵棵棵树；飞向天空的，变成翱翔的翅膀，充满力量，披挂光芒。

拿到《青春恰自来》的时候，被封面上浮雕烫印的蒲公英设计所吸引，它们随风而动，轻舞飞扬，好像一不小心就会飞出书本一样。翻开图书，你才发现，原来这些蒲公英的种子也飞到了书里，形在章前页脚，神在字里行间，从乌蒙山野飞到了黄浦江边，也从青苔的黑白双眸飞进你的心里。图书的装帧设计完美地适配了作者杨娟那种娓娓道来的表述方式，她自然而然地向你讲述少数民族山区孩子的成长故事，展现一个独眼女孩青苔独立的精神世界和青春向往，折射出一个时代充满曲折却不可逆转的前进力量。

蒲公英是这本小说的一种隐喻，封面的蒲公英凝结成文字再飘到封底变成诗歌，这让小说呈现出一种纯美表达，杨娟让这种表达更具有了现代感。儿童小说容易把纯美束缚在过去的场景和回忆的空间里，带着微微的苦涩。杨娟笔下的纯美元素更为多元，绿野环绕的茅草房子，热爱歌唱的苗家女孩、善解人意的外婆和老师，这些纯美的元素把乌蒙山区的贫苦生活挤榨出甜味来。然而，不止这些，书里的孩子同样上戏剧课，他们会弹吉他、爱踢足球，他们的行动实践和思维方式是属于现代的。杨娟甚至把故事从乌蒙山写到了大上海，“我倚在栏杆上，望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阳光把江水照成了金子，有微风吹来，吹起我的短发。”这种不同场域的跨度融合，让当下的读者更容易获得认可感。小说的记叙方式还呈现出一种韵律感，无论是写景抒情或是人物对话，都倾向于用短促而有节奏的表达方式。比如在对家乡乌蒙山的描绘中，杨娟触及到雨夜、云雾、野草，总是寥寥数语，却恰到好处地让读者能快速地融入她的叙事环境；再比如青苔和普军关于对外面世界的看法，一个质朴的苗家男孩说：“我心里很渴，就像这干旱的天气。”这种简单归真的表达让人很直接地嗅到苗家孩子的气息，却留有尾调让你探寻。在情节铺陈的过程中，杨娟适时地用歌曲来点缀，她还用书信的方式展现出另外一个时空的故事，让两条线索既单独推进又彼此交融。小说的写作因为富有韵律而让人有亲切感，就像溪水，以轻盈跳动的声色把你吸引过来，而当你更深入地接近它，甚至把双手插入流水中，就能感受到清冽的流水对你的抚摸和那无法阻挡、不容置疑地向前流去的力量。

蒲公英不畏渺小、志在远方的生存方式也是作者想要塑造的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苗家女孩，杨娟叫她“青苔”，和蒲公英一样，给一点雨水就能野蛮生长。苗家的孩子早熟而纯真，他们能劳动、爱玩耍，做完所有的家务后会爬上树梢唱歌，就像“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都比较容易满足”。小说不仅仅是要展现“青苔”生长的条件，更想表达“青苔”生长的力量，那是篆刻在青苔身上的独特印记。青苔虽是独眼女孩，却是村里最优秀男孩的心仪对象，因为她和其他村里的女孩不一样。她就像《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聪明机智，有胆识，有远见，追求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青苔是不愿意墨守成规的人，她的倔强和执着默默地影响着身边的人。除了青苔，杨娟还塑造了多种人物性格，比如外婆近乎偏执的坚守，没水的时候会用水洗脸，水脏的时候她会用明矾净水，甘愿为一个承诺而守候一生；比如秉承全新教学理念的甘甜等大学生老师，他们锐意进取，想用演讲、音乐等方式激发起苗寨孩子学习的兴趣。当然，这些人格都是有热度的，积极向上的，但并不是真实的全部，生活总有其冰冷的一面。小说中普军的叔叔是一个典型的苗寨男人，他嗜酒如命，无酒不欢，发酒疯、打孩子是他酒后的常态，麻醉自己是他生命的本能，基因的习惯。小说中的他已经意识到酗酒的罪恶，他爱普军，为了寻找普军险些跌下山崖丢失性命，他为此发誓不再饮酒，他也识善恶、有追求，对于陋习的依赖和美好的向往，这种无法突破的个体矛盾把他束缚在痛苦中。杨娟最终没有让他改变，没有让他接触到最后那束光，这才是真实的残酷。

儿童小说的人格塑造往往是艰难的，主人公的身体和心智常常处于一个成长和变化的过程，作者又因为读者对象而刻意规避人性中“恶”的一面。杨娟把塑造的主体放在苗家山寨的环境中，把年龄定位在“青春”阶段，独眼女孩相对成熟的倔强和坚持因而也不再显得违和。同时，作者引入了多样化的配角，既有孩子，也有成人，让他们在舞台中呈现出各自的冷暖色，相互映衬，让读者体味到寒冬的凛冽之后，才能深知暖阳的可贵。

小说是一本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杨娟经历支教生活之后的所见所思所悟，它触及到少数民族、残障人士、脱贫致富等热点话题，定位在儿童的视角之上。作者在触碰这些话题的时候，依然用蒲公英播种的方式，随着风轻轻地飘向读者，不经意间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开花。

在花里，你可以看到青春，也可以看到梦想。小说至少表现了三代人的青春和梦想，信的主人梦想着能和外婆有一个家，能回到石门坎教书，带一支足球队；支教的老师们梦想他们的孩子都能考上高等学校，继续学习；青苔梦想着把歌唱出大山，普军梦想着把球踢向世界。在杨娟的笔下，青春和梦想相互交织，绵延不断，她写道：“他的时代过去了，那一代人的青春也不在了。可是，我们的青春却来了，我们的灯火还在。”

在花里，你可以看到关爱，看到温情。义务教育普及之后，苗寨依然有辍学和早婚等陋习，但当支教老师要离开的时候，却挤满了送别的人群，他们的心理已经种下了对老师和教育的依赖，作者写道：“种子种下了，迟早会发芽的。”普军失去双亲，只是继养在叔叔家的孩子，他执拗地不愿意相信叔叔和堂哥对他有至亲之爱，淳朴的苗家汉子虽然有致命的习惯缺陷，却丝毫不减对普军的爱，叔叔死后，堂哥普凡坚毅地说：“所以，你必须读下去。爸没死，我来供你读书。”外婆与信中男孩用一生坚守了他们的爱情，并把它铸就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四叶草吊坠上，然而为了青苔，外婆还是把它卖了，她摸着青苔的头说：“青苔，你才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在花里，你可以看到成长，也可以看到改变。小说是以在贫困山区找水源为线索而展开的，我们看到了山区的改变，他们修建了水库，找到了生活的水源；他们修建了公路，建设了天麻外销基地。为落后地区提供必要的生活基础物质，是实现脱贫的基本条件，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贫穷不仅仅在于物质，还在于观念，因为观念导致了对物质索取的惰性，而匮乏的物质又反过来限制了人们的观念，需要有人来传播新的观念，于是支教老师们来无私奉献，他们扎根山区，把自己变成联通的纽带。同样，也需要有关键人物的引领，于是青苔出现了，她的思维和追求明显超出了当下环境的普遍认知，她的成长不仅仅是给自己的希望，也给予别人一个提示：原来生活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和另外一种可能。我们欣喜地看到，苗寨已经渐渐地发生着变化，比如青苔的同学张红虽然遵循着陈旧观念辍学嫁人，可是，她嫁的苗家男孩已经不再酗酒，她虽然穿着苗衣在刺绣，但也开始在线读大学医科。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改变。

《青春恰自来》是杨娟的第二部小说，获选“中国好书”月度榜，可见她的写作天赋。用杨娟自己的话说，她是在被生活揉碎之后，才用笔唱出生命的歌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就仿佛蒲公英的种子总会被风揉碎，但却揉不碎它们飘向远方的本能和希望。在杨娟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青苔的青春，也可看到自己的青春。无论是故事还是生活里，青春不仅仅是年龄，它其实是一种力量和一份梦想，可以化成一封信或一首歌。正如小美老师对青苔说的那样：“青苔，你的心里有歌，我能听到。”相信《青春恰自来》的歌，我们都能听到。

让青春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飘散

——评《青春恰自来》

□许建



杨娟最终没有让他改变，没有让他接触到最后那束光，这才是真实的残酷。



《青春恰自来》内页插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